



■ 校园故事

何必互相“为荣”

吴非 杂文家

教师的教育和学生的学习，都应有正确的价值追求，学校是学生成长的地方，也是教师实现生命价值的地方，这里不需要交换，更不是一场交易。

新生入学教育，学校请我作校史讲话。新生接受的宣传中，有个流行甚广的口号——“今天我以学校为荣，明天学校以我为荣”，几乎人人会说，很多学校也曾把它悬挂在校园里，但我一直不以为然。

我对学生说，考取这所学校，大家很开心，在亲友中很有“面子”。然而，这所学校的荣誉是很多前辈创造的，简单地说，都是别人的劳动，你的学习还没有开始，何必以它为你的“荣”呢？再说，你努力学习，有所成就，是你个人的事；我们作为教师，有自己的世界，有自己的生命价值，我又何必以你的成就“为荣”呢？

讲座结束，互动阶段有学生提问，问我“为什么要批判这个口号”。我说谈不上“批判”，只是作为老教师，对这样的观念有点自己的思考而已。在大会上回答新生的提问，很怕说不清，但我还是说了。我说，一个人的自信要靠“名校”撑着，靠不住。比如，我为什么要“以学校为荣”呢？我的学校虽然有一百多年历史，但是，有能“为荣”的，也必有“不太‘荣’”的，甚至会有“为耻”的。学生只知道“名校”的经历会给他带去尊崇，他会接受人们钦羡的目光，他会自认为鹤立

鸡群，能得到一般人不可能获得的优质教育，他填写的履历将很“光彩”……可是，这都属于“学校给了我什么”，而不是“我为社会做了什么”。

至于以为母校今后要以他为荣，则未免夜郎自大了。学生学舌，说“我们学校培养了55名两院院士”，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纠正：“曾有55位两院院士在这里读过书”。——很多校长和教师都没把自己送进一所像样的大学，怎么可能把别人培养为院士呢？学校不能把人的个人奋斗全当作教育的业绩，那样不利于学生树立自主的学习观念。

每个人的努力工作都是对生命的热爱和尊重，我们的荣誉感要建立在个人对生命和生活的正确认识上。教师的教育和学生的学习，都应有正确的价值追求，学校是学生成长的地方，也是教师实现生命价值的地方，这里不需要交换，更不是一场交易。

在高一新生班，一些名校考来的学生不免有些优越感，他们总是有意无意地说初中的事，也有学生在随笔中写道：“我初中读的是一所末流学校”；“我的初中，学校条件差，连食堂也没有”。我会在他们的习作后批上一句“但我认为你的初中母校很棒，你看，你的作业习惯很好”，我还会说“感谢你的初中老师，我很想认识他们”。

听了我的讲话，一些学生仍然有些茫然，他们可能觉得这个老师太“冷”，刚刚入学，便朝着他们的激情泼了冷水。可是我没办法，我们的教育应当是“人的教育”，所以，在开始阶段就不能犯错误。(13)

■ 舆论场

舆论事件命名：地名？日期？

邹振东 厦门卫视总监

一个事件，如果必须永远铭记，才能推动历史的进步，那么为了不被忘却的纪念，对它最好是以日期命名。

进入舆论场，必须重命名。最常见的方法就是用空间或者时间命名。

1941年1月4日，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约9000多人向长江以北转移，6日，行至皖南泾县茂林时，遭到国民党军8万多人的伏击；新四军奋战七昼夜，弹尽粮绝，除约2000人突围外，大部被俘、失散或阵亡。这就是被周恩来称之为“千古奇冤”的皖南事变。

1947年2月27日，国民党专卖局在台北查禁烟贩的粗暴行为，激起民愤，2月28日，台北市市民罢市、游行请愿，遭到国民党当局强行镇压，随后爆发大规模武装暴动，国民党政府从大陆调集军队进行全省大屠杀，史称“2·28事件”。

这两个悲剧事件，都发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，都和国民党有关，为什么一个以事发地取名，另一个却以事发时间命

名呢？换句话说，为什么皖南事变不可以叫做“一六事变”？或者，为什么“2·28事件”不可以叫做“台北（台湾）事件”呢？

我们不知道命名的奥秘，但我们却可以追问如此命名的后续。

皖南事变没有按日期命名，1月6日没有成为普遍的纪念日，尽管后来有皖南事变50周年、七十周年类似的纪念，但都是就事论事的活动，没有演变成当代的舆论事件。

“2·28事件”则不同，在台湾的威权时期，每逢2月28日前后，就是国民党大局的敏感时期，国民党如临大敌，媒体也对此讳莫如深。1988年，蒋经国去世，李登辉夺得大位，立即公开宣布：“2·28事件是台湾人的悲剧。”这一石破天惊的宣告，让李登辉攫取民意，巩固统治，用“省籍议题”开台湾族群政治的先河。1989年，侯孝贤打破台湾社会的禁忌话题，推出“2·28事件”为题材的电影《悲情城市》，一播出即引发万人空巷。民进党继承了李登辉用“2·28事件”挑起省籍议题捞取政治资本的衣钵，直到2004年，民进党还动员百万民众，在2月28日大搞“二二八守护台湾”，“2·28

事件”成为国民党挥之不去的梦魇，偏偏2012年之前的台湾大选，都在三月份，刚好在2月28日之后。国民党内屈指可数的可以打破“二二八”魔咒的政治领袖首推马英九，马英九很早就开始在每一年的2月28日，向“2·28事件”的受难者及其家属鞠躬道歉，认错反思：“二二八不是族群冲突，而是官逼民反”，“错误可以原谅，但绝不能忘记”，“让上代损失 变下代资产”……马英九的这些话展现出历史的担当，赢得民意。

以日期命名的事件，许多至今还在发酵，它们不断卷入当代的舆论场，甚至演化成新的舆论事件。直到今天，“二二八”仍然是台湾的舆论禁忌，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，2月28日，没有人，特别是政治人物，敢在这一天举办开业、封顶、婚庆这样的庆典，就像大陆的“九一八”，少有机敢在9月18日这一天狂欢庆典。

一个事件，如果必须永远铭记，才能推动历史的进步，那么为了不被忘却的纪念，对它最好是以日期命名；而如果人类的共识是希望尽快翻过这一页，那么放下历史包袱的最佳选择，就是对它不要用日期命名。(3)

■ 看见想到

迈向现代化之路

林达 著名作家

假如根本不信奉制度的规则，就不会照规则去做，哪怕移植先进制度，实行也会大打折扣。所以我想，印度等亚洲民主国家，都有他们与特定社会文化相连的特殊经验教训，他们的经验需要学习，教训也不必避讳。

2007年我去过一次印度，三年之后又去了一次。我发现，它和中国一样，机场变化是它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象征。

第一次接触新德里机场，惊讶的不是它的破旧，而是其他。例如，夜里，机场门外地上，睡了许多从头到脚都被布裹住的人；在从机场进城的路上，出租车超越了一头大象；回程班机晚点十几个小时不算什么，奇怪的是找不到有关航班的任何消息，连个小黑板告示都没有。三年后，现代化管理的新德里机场，技术先进，美轮美奂。进城的路不仅开阔，隔离带在大规模造景，而且两边的房子，到处是“拆”的标记。

第一次去印度，曾住在新德里火车站附近的旅馆，旅馆外面曲里拐弯一大片

街区，那就是著名的大巴扎。每天晚上，我们都会在那里逛，红红火火的小店小铺，瘦瘦游荡的神牛和众多好奇的洋人挤在一起，空气中混合着牛粪和人尿的味道，蔚为壮观。挡不住的异国情调，扑面而来。记得临走，我们又在那里住了两天，临走选中一家小铺子，店主是兄弟二人，分管着几个店面，那弟弟不仅聪明，还有着印度旅游业稀缺的诚实，我们聊了很久，最后剩的卢比，都留在了他的铺子里，换成了丁零当啷的银首饰。

三年后，没有再住那个街区。可临走又剩一点卢比，又想念起那个卖首饰的聪明年轻人。进入街区，没料想大巴扎也变了。原先窄窄挤挤的小街似乎变宽，有两家店面安上了大玻璃，虽小，却很有点现代派头。甚至还找到一家西式速食小馆午餐。空气中少了异味：修了简单小便池，神牛也了无踪迹。和以前相比，显得稀稀拉拉，小摊小贩少了很多，如潮的洋人也一并退去。找了很久，才找到他：借着别人店铺一角，他摆了个小小柜台，生意大大缩水。

我们如老友重逢，喜出望外的感觉。遂问起他和大巴扎的变化。他突然很激动：“谁会相信这种事情！那天政府的人来，说要拓宽街道，就给我们十五分钟离开。我疯了一样，拿

大塑料袋把所有首饰扫进去，背着就逃。十五分钟，推土机就上来了。”我们目瞪口呆、深表同情。我说，不能吧？你们六十年的民主，英国人留下的司法制度，去告啊！他笑了，指着斜对面紧闭大门的旅馆，“那个旅馆老板就去告了，输了官司不说，政府的人来，还扇了他大嘴巴，说谁让你去告的。”令人感动的是，他对生活很乐观，笑得很甜说：“挺好，终于成家了。”

印度经济也是后起之秀，它经济改革的关键转折，是私有经济突破国家管制，才开始起飞。它六十年的发展进程无疑也走过弯路。我想，如福山所说，“穷国之所以穷，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资源，而是因为他们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。”在他看来，缺乏强大的法治是“穷国无法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。”同时，一种不是原生的制度，要创建也并不容易。假如根本不信奉制度的规则，就不会照规则去做，哪怕移植先进制度，实行也会大打折扣。所以我想，印度等亚洲民主国家，都有他们与特定社会文化相连的特殊经验教训，他们的经验需要学习，教训也不必避讳。(5)

